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秦和珍毕业于兖州滋阳第四乡村师范学校,在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回到家乡,经翟子超介绍,到第一高小任国文教员。之后,秦和珍、翟子超一起以党员身份开始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发展郭耕夫、周又程、李如沆为共产党员,建立起金乡县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金乡县第一高小支部。

金乡县还有一个考取清华大学的王鉴览。王鉴览,1917年出生于金乡县北郊孙庄村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就十分聪明,是金乡县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王鉴览在北平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他到济南与山东省委取得了联系,山东省委派他回老家金乡工作。王鉴览回到金乡的消息,在回乡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共产党员翟子超和耿荆山就去找王鉴览。在王鉴览家的南屋里,三个人各坐在一块砖头上,王鉴览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联络当地的党员,组建中共金乡县工委,发动群众建立抗日自卫武装。接着,王鉴览宣布,由王鉴览、翟子超、耿荆山三人组成的中共金乡县工作委员会成立,三个人都是工委委员。翟子超、耿荆山推举王鉴览担任县工委书记,但是王鉴览感觉自己才20岁,而翟子超今年25岁,耿荆山30岁了,自己哪里好意思当县工委书记?因此坚决不答应。大家互相谦让,这次会议没有选出县工委书记。但对工作作了具体分工,县工委确定以王鉴览家为联络点。

1937年10月,翟子超奉命到单县组建中共单县特别支部,并担任书记。翟子超临行前举荐了秦和珍,秦和珍接替他担任金乡县工委委员。

由于抗日形势趋于紧张,靠近县城的孙庄很不安全,为便于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金乡县工委决定将工委联络站由王鉴览家迁到离县城较远的耿楼村耿

荆山家。

他们搞到了收音机和油印机,编印抗日传单,油印小报,还组织了一批热血青年开展演讲、演唱、演戏,到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抗日必胜,抗战到底”“誓死不当亡国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口号深入人心。他们积极发展党组织,培养周五、杨如岱、刘清怀、张心通、袁汝英、袁文勋等人加入共产党,壮大了金乡县党的队伍。1937年底至1938年初,金乡县发展了近百名党员。

1937年11月上旬,金乡耿楼村耿荆山家来了几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青年人,他们是山东省委派来的四位同志——白子明、江明、孙衷文和孙志谦,他们要在这里建立中共鲁西南工作委员会,来统一领导金乡、单县、济宁等地的党组织。

白子明是山东省博兴人,1913年出生,毕业于济南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曾经先后任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济南市委书记。他长得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面容俊秀,风度翩翩。江明是山东掖县人,1911年出生,北平师范大学学生,1936年加入共产党,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而肄业。孙衷文是山东牟平人,1919年出生,又矮又瘦,也是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济南第一师范党支部书记。孙志谦1914年出生,山东曹县曹巨集人,在济南第一乡村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共产党,曾回乡在曹县发展了一批党员,又回到济南乡师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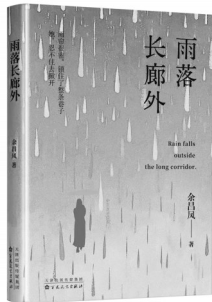
省委任命白子明担任书记,江明和孙衷文担任工委委员,孙志谦担任工委巡视员。他们看到耿荆山家的条件很好,交通也便利,就商议把鲁西南工委也设在了耿荆山家里。

(未完待续)

荐书堂



主办单位: 济宁晚报 济宁亚龙书城



《雨落长廊外》

近日,湖北鄂州作家余昌凤诗集《雨落长廊外》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该诗集共分为“原是寻常最动人”“一些影子,轻轻拂过湖面”“比起爱你,你更爱我们”“把伤疤当酒窝”“童年流光”五辑。这部诗集包含了生活百态与人生感悟,能够带领读者穿梭于不同的情感与记忆场景之中。余昌凤将内心深处的情感倾泻于笔端,真实而强烈,同时,巧妙运用意象,将情感与自然、生活场景相融合,使诗句富有画面感与感染力。无论是对亲情的珍视,还是对过往经历的感悟,都让读者深切感受到诗人的真诚与温暖。

余昌凤,笔名花瓣雨,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鄂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花雨诗苑诗社社长,《中国女子诗刊》主编。作品在《诗刊》《北京文学》《星星》《诗选刊》《诗潮》《诗歌月刊》等百余家报刊并入选多部选本。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故知鲁

曲阜碑刻(五十八)

元张起岩、周伯琦 谒孔林赞碑

张铤毅

元张起岩、周伯琦谒孔林赞碑立于元惠宗后至元六年,即公元1340年。石碑高0.6米、宽1.4米,由孔克钦树立。碑文内容是张起岩和周伯琦二人拜谒孔林时所作的五言律诗。碑文共计39行,每行15字。这些诗的内容也见于《阙里志》和《阙里文献考》。

古木森森、绿柏茵茵,“谒孔林赞碑”就这样隐藏在孔林茫茫碑林之中,而那两首五言律诗,则见证了两位儒士在元代至元六年于曲阜的一次相逢。我们可以想象:在那样一个儒家不显、文道不昌的时代,两位儒士怀着多么激动的心情来到孔林,各做诗一首表达文人对儒家圣贤的敬仰,和对文脉的坚持与追求。

张起岩出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其家世代簪缨。他与元代文学家刘敏中、张养浩皆为同乡,张起岩自称刘敏中、张养浩的门生。元仁宗即位后首次开科取士,张起岩即高中状元。

作为政治家,张起岩是相当出色的。他不但为官清廉、处事公正,而且外和中刚、正色立朝,当时便有人称他为“当世欧阳修”。他当福山县学教谕时,曾短期代理县务,赢得了百姓的交口称赞:“若得张教谕为真县尹,吾属何患焉。”张起岩不但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还是一个有极高造诣和成就的历史学家。由于他博览群书、学问渊博,熟悉金、辽典章制度、宋儒道学原委,从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开始他奉诏参加了辽、金、宋三史的编撰工作。在三史的编撰中,对别人的稿子他总是一字一句地进行修改,以史为据,据理审定。同时,张起岩还是一位文学家,他才思敏捷、文笔优美,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文集,如《华峰漫稿》《华峰类稿》《金陵集》等。

张起岩擅长书法,尤精篆、隶,并留有书迹《赠季境诗》等。而这首刻于孔林的五言律诗,正是张起岩在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使任上完成的。张起岩一生热爱旅游,四十年的仕宦生涯让他游遍了全国的大好河山,并留下诸多诗词歌赋和石刻碑记。

在元惠宗后至元六年的八月,张起岩来曲阜观游,而同一时间,曲阜来了另一位奉诏祭祀孔子的大儒——周伯琦。周伯琦可以称得上是元朝士大夫的典范,在文学、书法和政治领域均有所成就,受到当时及后世的诸多赞誉。他博学、善作文章,著有《六书正讹》《说文文字原》及诗文稿若干卷,所作诗歌内容丰富,且寓言性强,情感深沉,为时人所称道;而在书法上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他的篆书师法徐铉,张有,被称为“本朝之冠”。其行、楷书受到赵孟頫影响,但也有自己的风格。他注重技法,主张“技近乎道”,将书法的艺术性与人品、学养、情感等相融合,在元末引领了江南复古书风。而在政治上,周伯琦也是官运亨通,担任过许多官职。可以说周伯琦在人生经历上和张起岩有诸多相似之处,如此相似的身份和人生经历,周张二人

能共同游历曲阜、谒孔林写诗,自然是水到渠成。

这个时候的周伯琦正春风得意,因为他得了扈从元惠宗的机会。周伯琦于至正十二年由翰林修撰升任监察御史,由此获得扈从资格。监察御史作为监察系统官员,扈从职责包含记录皇帝巡行、监察百官行为及参与祭祀礼仪等。能被选为扈从的汉人,一般都是比较受元朝皇帝重视和喜爱的人,周伯琦这次参与扈从,不仅有机会“扈从滦阳”,而且“屡草诏命”,还“奉诏代祀孔子于曲阜”。于是他便留在曲阜,代替皇帝祭孔。祭孔乃是国家大事,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若不能亲自祭孔,一般也会命令重要官员代为祭祀。周伯琦恰逢这重大使命,所以他才会在曲阜,与游历至此的张起岩相逢,而成就一桩美谈。

在此之后不久,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张起岩又受山东北路都转运使廉公亮的邀请到济南一同游览西佛峪,并留下三处石刻。不过,此时的元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恐怕难以让张起岩继续去闲情雅致的游山玩水了。次年,张起岩出任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周伯琦也不再清闲,回京城担任宣文阁授经郎,“教威里大臣子弟,每进讲,辄称旨,且日被顾问”。

一块石碑,见证了两位大儒一段奇妙的缘分,更见证了他们对孔孟圣贤之道的不懈追求。当今人在此注视这块碑时,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两位儒者的身影,更是一部流动的儒家精神史诗。张起岩和周伯琦挥毫泼墨写就的动人诗篇,与孔林中的四季常青柏一道,构成了中华文化最动人的生命图景。那些在历史夹缝中守护文脉的身影,终将与孔子一起,化作照亮文明星空的点点繁星,诉说着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永恒命题。